

胡小林
张伯存
姜智芹 | 著

山 东 省 社 科 十 五 规 划 课 题

山东文学的域外镜像

山东文史出版社

胡小林
张伯存 著
姜智芹

山东高校十五周年校庆

山东文学的域外镜像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东文学的域外镜像/胡小林, 张伯存, 姜智芹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3. 8

ISBN 7-5329-2180-8

I. 山… II. ①胡… ②张… ③姜…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山东省 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山东省 IV. I209.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60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千字/215

印 数 1-3000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第一 章	山东文学研究的“他者”视角	1
第二 章	全球视野中的山东文学	17
第三 章	齐鲁文学精魂与俄罗斯文学血脉的叠合	39
第四 章	青春诗人的生命沉思	62
第五 章	“地之子”的静美“画廊”与英国散文	77
第六 章	行云上的漂泊情感	91
第七 章	“泥土诗人”的坚忍与苦吟	101
第八 章	跨越久远时空的文学对话	123
第九 章	文学王国的缔造者	154
第十 章	两块神奇土地的文学精灵	173
第十一 章	歌吟大自然的双重变奏	184
第十二 章	道德理想主义者的文学心迹	205
第十三 章	矗立着的硬汉群雕	224
第十四 章	小村与小镇构筑的人类寓言世界	239
第十五 章	医生在社会病症中的艰难选择	253
第十六 章	中外战争文学背景下的深度开掘	264
第十七 章	开放的现实主义之路	275
第十八 章	回归本土的新探寻	288
第十九 章	皈依传统的民间叙事	298
后 记	313	

第一章 山东文学研究的 “他者” 视角

一、“他者” 研究视角的提出：全球化 影响与世界文学格局的形成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并给文学研究带来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就文学研究的主体而言，全球化促进了文学研究者对主体自限的超越。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主体自然是本民族文化的主体，研究中国文学的一般是中国文化的传人，也就是自然文化主体，他们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本民族所特有的，对外来方法的借鉴和使用在以前并没有引起研究者太多的注意。由于缺乏参照系，文学研究主体只能把自我作为中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于本民族的内倾和对异族文学的漠视、误读，这种状况就是主体自限。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心理定势逐渐

被打破，特别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比较文学，以超越主体自限为目标，力求用自我与他者两种视角的协调来从事文学研究。二十世纪哈贝马斯的“互为主体”、巴赫金的“他者”等理论，为文学研究主体进行自我超越奠定了基础，促使他们形成比较思维的新观念，大大促进了人类文化的整体研究。

第二，从文学研究的客体，即文学研究的对象来说，全球化的影响使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取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其代表作《媒介概论——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现代电子媒介的应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整个世界几乎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地球村”意识打破了民族文学之间的壁垒，把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学都纳入了人类文化的整体之中。因特网上，文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国界，实现了空间上的“天涯若比邻”。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学都面临着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归宿的问题。在众多其他民族文学面前，一国的文学研究者不可能无视“他者”的存在而专注于本民族的文学。多元文化的视野，多种参照系的存在，使研究者不自觉地采取比较的眼光，将他民族的文学作为反观本民族文学的一面镜子。由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多侧面的、网络化的，因而文学交流的渠道越多，可资借鉴、比较的角度也就越多，对本国、本民族文学的认识也就越深刻。

我们的研究内容、方法正是基于全球化进程赋予文学研究的新思维而提出来的。

二十世纪的山东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纳入了世界文学格局之中，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不少作家的创作中都渗透着世界文学因子，单纯从中国文学内部来研究山东文学，难以回答它所面临的许多复杂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广阔的、跨文化研究的视野，比较文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野。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进程从经济—技术层面向文化—精神层面的迈进，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都融进了许多世界因素，比较文学有意无意地体现了今日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成为提升文学批评和研究水准的一条重要途径。本课题以“他者”的眼光，将相关的外国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流派作为审视山东文学创作的参照系，力求在山东文学研究方面推陈出新。

二、“他者”研究视角的创新性

人类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跳出自我，从外在于自我的角度来观察自身。早在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彭斯就在诗句中表达出这样的渴望：“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能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①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外在于自我的角度呢？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有一个“他者”，也就是一个“参照系”。

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 对某一事物、现象的认识，一般来说有两种主要方法，或者说有两个主要视角：内在视角与外在视角。所谓内在视角就是不依靠外物，从一事物内部去

^① 罗伯特·彭斯《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认识自身。目前的山东文学研究，大多采取的是内在视角。比如，研究张炜，注重的是他作品中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对现代文明戕害人伦道德的抨击，是一种内向的探究。这种内在视角的好处是可以排除外在事物的干扰，在清澈纯净的自我意识审视下，洞悉自身的一些优点和缺点。但这种认识方式也有自身的缺陷，由于受自身经验的限制，对自身经验之外的东西，往往难以进行准确的判断。人们早已觉察到这种从自身经验出发，认识自身的方式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老子就说过“自见者不明”，苏轼在《题西林壁》中也写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富含哲理的诗句。很多时候，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一种事物，人们还需要一种外在视点，借助一个外在的参照物来反观这一事物，把外在参照物当作一面镜子，反照出自身的特点。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一切事物、现象也都具有了更加复杂、多维的特征，外在参照系的引入就显得越发必要。就山东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来说，山东现当代文学已经融入了世界文学格局之中，文学创作中也渗透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因子。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内视点研究显然不能够揭示出山东文学的多维内涵，我们有必要借助文学研究中的“他者”，采取异文化的外在视角，发掘从内部难以发现的东西，深化、丰富山东文学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巴赫金有着精辟的见解，他说：“在文化领域内，外在性是理解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异种文化只有在他者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① E

^① 巴赫金《言辞美学》，转引自刘宁译《巴赫金论文两篇》，见《世界文学》，1999年第5期。

·萨义德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指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自己相仿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①

参照系决定事物的性质 任何研究都包含着对研究对象质的探求，而探求的方式从古典到现代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古典的探求方式表现为对本质的追求，而本质追求又具体表现为对公理、定理、公式的追求，一旦找到了事物的公理、定理和公式，就找到了事物的本质。这是一种共同的认识，从西方到东方莫不如此，柏拉图的理式，基督教的上帝，黑格尔的理念，中国的儒、道、释，追求的都是永恒真理。而现代科学认为，人之所以从事物中找到公理、定理、公式，一方面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于人寻找的方式。事物显现为怎样一种性质，与人寻找的方式和实验、设计密切相关，用现代自然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怎样提问，自然就怎样回答。按照从爱因斯坦到福柯、德里达这些现代思想家所共同表现出来的精神来看，事物并不存在一个最后的本质，事物显现为一个怎样的面貌，在于从什么样的语境去观察，在于把它引入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一部作品显现为什么特征，同样也在于把它引入一个什么样的参照系。从作者的生平和个性来看，作品显现为一种性质；把作品放在同一类作品中，作品又显现为另一种性质；以异质文化的眼

^①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46页。

光来审视它时，又显现出与前两种不同的性质……如此看来，作品的本质就应该是多种参照系中显现出来的性质的总和。然而，历史是一个绵延不断的过程，它不会在某一特定的参照系上停下来，新的参照系会不断出现，因此有必要对原有的参照系进行更新和改进，使事物向更深、更远处发展。

事物的性质是由参照系决定的，这是现代科学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为从“他者”视角研究山东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山东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新的参照系的引入，会使它在原有参照系中无法显现的性质显现出来，从而深化对山东文学的认识。

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与跨文化研究

我们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范畴，涉及到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问题。比较文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是为了反对孤立地研究民族文学和国别文学而出现的，它经历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联系，平行研究强调文学性、可比性（没有事实联系的两个和多个文学对象之间），跨文化研究倡导跨越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文学比较。

影响研究 “影响研究”最早出现在法国，指在一个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外来因素。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T·肖在论及“影响”时这样说：“一位作家和他的艺术作品，如果显示出某种外来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又是他的本国文学传统和他本人的发展无法解释的，那么，

我们可以说这位作家受到了外国作家的影响。”^① 而且这种影响经过吸收、消化，已经渗透到本民族的文学之中，参与了艺术创造和民族文学发展的过程，并成为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影响”和“模仿”不同，“模仿”在美国著名学者韦斯坦因看来，是指“一个作家最大限度地放弃自己的个性去依从另一个作家的路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② 影响是作为一种精神、心理的现象而存在的，是对异域因素的吸收、消化，并在此基础上的超越。因此，作家们不必羞于承认自己受到过别人的影响，影响是对创作灵感的激发，是对创新能力的启迪，受影响的作家创作的作品完全是他自己的，“影响”和独创性非但不矛盾，反而息息相关。韦斯坦因还进一步说道：“从原则上说，比较学者绝不应对影响中的主动（给予）和被动（接受）因素作质量上的区分，因为接受影响既不是耻辱，给予影响也没有荣耀。”^③ 因此，我们说，影响不是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主宰，施予影响者和接受影响者是平等的，施予影响者可以因其不朽的创作而流芳百世，接受影响者也会因其创造性的转变而名垂千古。

域外作家对山东作家产生影响、山东作家对域外作家进行接受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过滤。所谓文化

① 转引自乌尔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②③ 乌利希·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过滤，指的是根据自身文化积淀、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和重组，在认同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误读和变异。过去人们对误读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对别国作品的不正确解读。其实，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接受别国文学时，误读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它们。台湾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通过一则寓言，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从前在水底里住着一个青蛙和一条鱼，它们常常一起泳耍，成为好友。有一天，青蛙无意中跳出水面，在陆地上游了一整天，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如人啦，鸟啦，车啦，不一而足。它看得开心死了，便决意返回水里，向他的好友鱼报告一切。它看见了鱼便说，陆地的世界精彩极了，有人，身穿衣裳，头戴帽子，手握拐杖，足履鞋子；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鱼，身穿衣服，头戴帽子，翅挟手杖，鞋子则吊在下身的尾翅上。青蛙又说，有鸟，可展翼在空中飞翔；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腾空展翼而飞的鱼。青蛙又说，有车，带着四个轮子滚动前进；此时，在鱼的脑中便出现了一条带着四个圆轮子的鱼……”^① 一国作家对另一国作家的了解虽然不至于像鱼对大陆那样无知，但由于各自文化传统的不同所构成的前理解，仍然制约着彼此的文学沟通。但比较文学中的误读在有些情况下也并非完全是坏事，“误读”不仅难以避免，而且有时在文学发展中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茅盾对尼采的误读。尼采提出人类生

^① 李达三、罗钢主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5页。

活中最强烈的意志是权力意志，强权者不应该悲悯弱小者。茅盾当时作为弱国的一员，从反侵略、反征服的角度来解读他，因为人类有向往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苟且偷生，而要不畏强权，求取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误读”变成了创造性的“悟读”。山东作家在对域外作家进行接受时就有这方面的“悟读”。比如张炜，他和海明威都塑造了“硬汉子”形象，但海明威的硬汉子大都表现出远离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而张炜的主人公则积极介入社会，干预现实，由“小我”而“大我”，由现实而将来而历史。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深层文化结构所致。美国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重视个人，强调个性和个人至上，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力。而中华民族则重视集体，强调社会性，倡导自我节制、奉献社会，而且中国的文人历来身负使命感和责任感，有着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强调文以载道，主张文学干预现实生活。因而张炜的硬汉子是融入集体、关注集体利益的硬汉子，是疾恶现实黑暗的硬汉子，而海明威所依傍的文化传统则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的漠然旁观与以自我为中心。文学是一定文化结构的产物，由于东西方深层文化结构的差异，山东作家在接受域外文学时，用自身的文化传统对之进行过滤，因而产生了变异。但发生了哪些变异？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异？变异的深层蕴涵是什么？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要去着力挖掘的。

影响研究尽管后来遭到以雷纳·韦勒克为首的美国学派的责难，它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仍不可动摇，甚至时至今日仍是比较文学中的支柱研究之一。对于这一点就连美国学派的约瑟夫·肖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有过这样精辟的论述：

“直接的文学关系的研究和文学借鉴的研究仍是文学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任何新的文学研究的书目都可以表明，这类研究在比较文学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被人认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各种研究领域，无论是平行类同的研究，各种流派的研究，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或是各种主题及其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学中不同的研究等等，都不能取消直接文学关系这一项研究存在的理由。”^①因此，影响研究至今仍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为我们本课题中的影响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进行影响研究的分析与探讨时，我们要注意借鉴与创新的问题。在多元文化杂然并陈、信息交流迅疾快捷的今天，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文学借鉴已不可避免。借鉴是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重要渠道之一，它能为本民族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借鉴使世界各国文学之间相互丰富着、滋养着，民族文学因借鉴而变得多彩多姿，世界文学因借鉴而达到彼此的交融。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是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之本，文学更需要创新，没有新意的作品只能遭到读者的冷落和遗弃。创新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源自主体内部的独创，一种是借鉴中的创新，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第二种情况，即对外国文学借鉴中的创新。在文学创作中，借鉴世界文学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借鉴者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向文学创作的巅峰攀进。山东作家在借鉴外国文学丰富自己的创作方面有不少成功的

^① 约瑟夫·肖《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转引自张陵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4页。

例子，以张炜为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契合了他内心深处的自然情结和天性中的诗意图追求，使他创作出清新、质朴的田园牧歌；托尔斯泰赋予了他深邃的思想和高远的目光，使他懂得要成为一个大作家，必须要有一颗大心，要关怀巨大的事物，要为全人类而创作；海明威洗练的文笔使他的作品单纯省净；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唤起了他扑朔迷离的乡村生活记忆……

借鉴与创新不仅有事实存在，还有科学依据。系统论告诉我们，整体并不简单地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而是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这之中的“大于”就是创新的成分。一个中国作家如果借鉴了外国文学中的东西，那么他创作出的作品就不应仅仅是中外因素的简单整合，他还需要用自己的知识、经验、阅历，甚至性格特征去进行创造性的融会，凝成新质。作家的文学知识、生活阅历、社会经验的丰富程度决定着作家的创新程度，文学知识、社会经验、生活阅历越丰富，创新的质素越多；反之，创新的质素越少。创作主体是创新的决定因素，当然，外部因素，像时代背景、社会意识等也不可忽视，但它们毕竟是外因，而外因是创新的条件，内因才是创新的根据。

文学借鉴也引出一个文学的民族性与外来文学的关系问题。在现今世界文学时代，各民族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异域文学的影响，不少人担心如果世界上各民族文学彼此之间不断借鉴的话，它们的独特性将面临着被淡化、同化甚至消弥的危险，这一担心并非完全杞人忧天，但我们又不能因此而抵制外来文化，因为二者不仅有矛盾相反的一面，还有矛盾相成的一面：民族文学通过借鉴、吸收异域文学，能对

自己的民族特色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从来没有哪个社会有过足够的推动力保证其永远生存，每一次文化输入，不管遭到排斥还是被吸收，都因引起反响而富于成效；排斥，刺激了吐故纳新；吸收，则增进了组织的发育。民族文学一方面要通过借鉴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身，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接受中的同化。真正的交流应该是将各种文化结为一体，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特性。面对两难处境，我们应该同时注意矛盾的两个方面，针对外来文化同化、消弥民族性的一面，在借鉴的同时要慎重选择，并努力消化之；针对其丰富、发展民族性的一面，则要在保持本民族文学特点和个性的同时，广泛借鉴、吸收，将其他民族文学的成果内化成本民族文学的血肉，因为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文学的民族性都绝非单纯由本民族的文化铸成，而是包含了异域文化成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学的民族性具有开放性，其自身结构在从古代向现代的漫长演变过程中，经历了由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变化，而在每一个开放时期，民族文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容纳了外来因素。因此我们说，民族文学、地域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只要把握好尺度，并不会取消它们的特色，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且会在与“他者”的互相渗透与影响中，形成和面不同、众声喧哗的格局。

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 强调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到了二十世纪中期逐渐显露出其狭隘性。一九五八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对以影响研究雄霸文坛几十年的法国学派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法国的影响研究只注意作品本身以外的东西，只研究来源和影响，使比较文学缩小成了研究文学的“外贸”，成了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

誉的附属学科，指出比较文学所研究的首先应是文学本身，而不是任何文学以外的东西。他把作品的“文学性”放在首要地位，强调不同文学之间的内在亲和性，并由此建立了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倡导无直接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美国学派中另一重要人物亨利·雷马克也说道，既然比较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显示一部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被比较的作品之间就不一定要有遗传的关系”。比较文学“强调的重点在于‘比较’。它可能显示某种关联性，但这种关联性可能与作者 A 在写作品 C 时是否认识外国作家 B 这一问题毫无关系”。^① 平行研究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使没有事实联系但具有可比性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在一定的逻辑维度上展开比较研究。平行研究是我们课题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不论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影响研究，还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平行研究，都是同一文化体系（以两希——古希腊、希伯莱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文学比较，它们的倡导者都不赞同把比较文学扩大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圈。美国比较文学权威韦斯坦因曾这样说道：“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

^①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见《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1 页。